

克劳德·罗森的中国情结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Claude Rawson's China Complex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尚必武 (Shang Biwu)

内容提要：克劳德·罗森教授于1935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先后任教于英国华威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是当今世界18世纪文学研究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本文作者在聂珍钊教授的介绍下，有幸结识罗森教授，并在担任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秘书长期间，因工作关系而获得了与罗森教授的诸多交流机会，深受罗森教授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感染，获益良多。2025年，罗森教授即将迎来自己的90华诞。本文借此机会，从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深切感受出发，重点记述了罗森教授的中国情结及其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事业的贡献。谨以此文，向罗森教授表达由衷的敬意。

关键词：克劳德·罗森；中国情结；上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英美小说研究。

Title: Claude Rawson's China Complex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Claude Rawson, born in Shanghai China in 1935, has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and Yale University successively. He is one of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scholars living today in the field of 18th-century literature studies.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meeting and knowing Rawson with the help of Nie Zhenzhao's introduction. Working as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 have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with Rawson, and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academic spirit and personal charm. The year 2025 is to witness Rawson's 90th birthday. Up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pay tribute to Rawson and to recount his China complex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drawing on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him.

Keywords: Claude Rawson; China complex; Shanghai;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Shang Biwu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nd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narratolog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fiction (Email: biwushang@sjtu.edu.cn).

罗森的中国情结

第一次对克劳德·罗森 (Claude Rawson) 的名字产生印象大约是在 20 年前。当时,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彼时的我开始疯狂迷恋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史,先后阅读了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拉曼·赛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勒内·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以及国内学者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等经典论著,而让我尤为震撼和大开眼界的是罗森教授主编的《剑桥文学批评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该丛书共有九卷,包括第一卷《古典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二卷《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第三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第四卷《十八世纪的文学批评》、第五卷《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第六卷《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第七卷《现代主义和新批评》、第八卷《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以及第九卷《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与心理的理论视野》。罗森教授本人负责担纲主编了第四卷《十八世纪的文学批评》。我本人的研究兴趣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重点研读了塞尔登主编的第八卷《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但罗森大名已经深深印刻于脑海之中。

第一次见到罗森教授应该是 2012 年初夏于华中师范大学。当时,我在聂珍钊教授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而罗森教授则是以教育部海外名师的身份前来中国讲学。罗森教授因为腿脚不便的缘故,拄着拐杖,为人谦和,憨态可掬,始终面带笑容,和前来打招呼的每一个人热情握手,并应邀和来听讲座的师生合影留念,没有任何架子。在讲座中,为了照顾现场大多是中文系的师生,他语速缓慢,不过演讲内容视野开阔,文本分析扎实,论述逻辑性强,层层推进,说理透彻,在互动环节也十分耐心回答师生的提问,颇有大师风范。在武汉桂子山,我不仅有幸聆听了罗森教授的精彩学术报告,而且在聂珍钊教授的邀请下,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席间,了解到罗森教授出生于上海,在 14 岁之前,一直都在上海生活。他对中国学术界的友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他对中国这份情感有密切的联系,离不开他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2017 年,国际权威期刊《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在该刊第 4 期发表了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对罗森教授的访谈。访谈长达 27 页,其中涉及他在上海生活的经历。在访谈中,罗森教授首次提到其父伯纳德·罗森鲍姆 (Bernard Rozenbaum) 是犹太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从波兰来到上海。当时一家住在上海的贝当路 (Avenue Pétain),即现在的上海衡山路。因为自己长期在中国生

活的经历，罗森教授在面对中国朋友的时候，经常为自己从未学过中文而感到万分遗憾。他说：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很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在面对我的中国东道主和中国朋友们的时候，就是直到今天我都还未学会中文。我父亲为我找了一个普通话家教，他每周或每两周来一次，但我总是逃课。这位普通话老师是一个有着蓄着小胡子、形象庄重的胖男人(……)无论如何，他似乎乐于与我串通一气，逃课，何况即使上课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当时上海街头并不说普通话，我甚至连当地的方言也没能好好掌握。(Rawson and Perloff 608)

罗森教授之所以因为自己不会中文而感到惭愧，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厚植于他把中国看成了自己的第一故乡，源自他对第一故乡的深厚感情。在访谈中，罗森教授提到自己曾一直渴望能有机会重访中国：

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到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我曾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也有机会到访过许多遥远的国家。虽然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受邀去中国，但始终未能如愿。1988年，我刚搬到耶鲁大学不久，文化委员会的文学部主任问我是否愿意在上海启动一项英国研究项目。她并不知道这是我出生的城市，尽管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接受，但这将意味着我要离开我在英国的家人一年，而当时我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我在耶鲁大学工作期间，我继续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先后去了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度(为了1988年埃利奥特诞辰百年纪念)、两次去了巴西，以及去了葡萄牙，那里是菲尔丁的安葬地，为了他的三百年诞辰，但从未去过中国。(Rawson and Perloff 626)

当时间推移到了21世纪后，罗森教授重回中国的愿望终于实现。2012年5月，罗森教授在时隔六十多年后再次到访中国。期间，他专门去了上海看一看他们一家曾住过的公寓(位于衡山路700号)，并同这栋保护完好、有着珍贵记忆的房子合影留念。罗森教授看到自己曾生活了14年的公寓，感慨万千，对上海关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刮目相看。他说：“欧洲人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定居点都被列入历史建筑，被看作是特殊的景点。它们现在通常都处于地价昂贵的位置，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晚上，上海、汉口、宁波等城市的银行和海关建筑旧址都由灯光点亮，令人印象深刻”(Rawson and Perloff 626)。罗森教授的此次中国之行，不仅满足了其多年来想要重回上海、再看一看自己魂牵梦绕的第一故乡的愿望，而且见证了文学研究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他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尤其是聂珍钊教授、王松林教授、苏晖教授、杜

娟教授等。

就罗森教授与其中国之缘而言，2012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不仅是罗森教授本人14岁离开上海后的第一次来到中国，而且他那部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经由王松林教授翻译，被纳入聂珍钊教授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2012年，聂珍钊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宣告成立。尽管罗森教授在当时还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4年后成为这一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但是他对聂珍钊教授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推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给中国大学生讲授欧洲（主要是英国）作家的時候，我意识到阅读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书本，部分原因是由于理论驱动的课程。我对于他们对圣经和古典传说和主题的熟悉程度，出人意料，也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这些内容在中国是有教授的，通常在中国文学和总体文学等专业中有教授，比如无比友善的聂教授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就是如此。聂教授通过主编两本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杂志来促进其对国际文学的兴趣，他是“伦理批评”协会的创始人，该协会正在积极发展，应该能够有效地对抗绕过阅读书本的对“文学”理论研究。对我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短暂的讲座访问中，我看到了聂教授在他的国内环境中不辞辛劳地举办诗歌朗诵和翻译活动，以及创作中英文诗歌和戏剧。也许在这样的背景下，远离我们学术文化中更枯燥的方式的大学中，正在培养对书本的浓厚兴趣。

在中国教学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满足感。尽管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但文化在学生中激发了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教师这一角色的尊敬，这对我来说格外令人振奋（……）我认为，由于语言和其他障碍，但非因注意力不集中，一部分内容会丢失，这无疑在每个学生身上都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如果幸运的话）整体的大部分内容都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在三小时的课程结束时，西方教师感到疲惫不堪，或者依靠通常在被动听讲时不会激活的肾上腺力量支撑着，但大多数学生仍在做笔记。他们对更多知识的渴求或者更好的理解看起来十分真诚，并且在课堂内外经常提出的热切问题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对我来说，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似乎表明了一种未经教导的、直率的“伦理”倾向，以一种好的意义上的天真而非简化（……）但是他们吸收了这种强调社会改良的观点，也许这正是聂氏的“伦理批评”试图触及的东西。（Rawson and Perloff 628-629）

在与帕洛夫教授对话的结尾，罗森教授不断提及聂珍钊教授及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积极影响，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有效地回应和抗击那些绕过书本、脱离文本、为理论而理论的文学研究。他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了聂珍钊教授所举办的系列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培养学生们对书本的浓厚兴趣。学生在课堂上和讲座中的提问交流表现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进而揭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伦理倾向”，强调“社会改良”（social improvement），而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实诉求之一。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中，聂珍钊教授强调：“目前中国对文学最大的伦理需要，就是文学要为建设良好的道德风尚服务，为净化社会风气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服务，为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服务。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要促进我国民族文学的繁荣，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责任，为把美好的中国梦变成中国的现实而服务。这些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责任，也是其追求的目标”（聂珍钊 5）。

罗森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2012年，罗森教授的中国之旅直接重新启动了他与中国学界的交往。在随后十多年里，罗森教授与中国学界保持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与学术交流，共同促进了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尤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众所周知，2012年12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正式宣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先生担任首届会长。翌年，罗森教授被推选为副会长，受邀参加了在宁波大学举办的“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题为“二战之后的18世纪文学：大学体验”的大会主旨发言。在发言中，罗森教授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花样繁多的文学批评理论让文学教授们津津乐道于这个主义，那个流派，却把文学最本质的东西——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善恶的区分抛到一边。这显然是在批评当时的批评界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徐燕 溪云 173-174）。回归文本、注重阅读是罗森教授对文学批评一贯立场，这也是他在一生中努力奉行的文学批评观。这在他那本备受赞誉的专著《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表现得尤为突出。该书中文译者王松林教授在翻译完该书后，有感而发，认为罗森教授的作品给了我们三点重要启示：“一是言之有物、不故弄玄虚；二是视野开阔，勇于创新；三是以微发著，思维活跃”（王松林 126）。

罗森教授强调文本细读、不故弄玄虚、反对用理论来肢解文本的做法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精神如出一辙。这也是罗森教授和以聂珍钊教授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者共同参与构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这一重要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原因。聂珍钊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

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与文学之间内在联系的批评，认为这类批评具有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错误倾向，它们“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命题、美学或哲学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即被解构了、被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身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片断”（聂珍钊 4）。

2017年，罗森教授当选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的会长。在罗森教授担任会长期间，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具国际影响。2017年夏，“第七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召开，罗森教授作为研究会会长亲临会场，并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致辞。在随后几年中，在每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开幕式上，罗森教授的致辞都成了一个保留节目，也是所有与会者期待的一个时刻。2013年，《世界文学研究论坛》第1期集中刊发了罗森教授5篇致辞。在这些致辞中，罗森教授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要阅读文本、切实在文本中发现作家们旨在讨论的问题。作为一名18世纪文学研究专家，罗森教授是属于老派的学者，在几乎所有的开幕式致辞中都反复强调要阅读文本，认为引导学生去阅读文本是大学教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罗森教授说：

与一些大学的最新趋势相反，作为文学教授，我们的主要责任是教导学生阅读书籍，其次才是关于书籍的书籍。文学（主要是，但不仅限于诗歌、戏剧和小说）以及对文学文本的知识和理解应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些是我们专家擅长的领域，而不是经济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甚至是阅读理论等辅助学科，除非它们能直接关联到主要研究对象，并支持对其的理解。这些话题，虽然对文学研究而言是辅助的，它们本身当然也很重要，应得到这些其他领域专家的关注，而非文学学者，除非它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具体而明显，并能支持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遗憾的是，我们这个行业中有人准备做任何事情而不是阅读书籍。这包括阅读行为理论家，以及描述阅读一本书是什么感觉的人，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为文本本身提供任何洞见，有时似乎是在没有实际阅读过的情况下构思出来的。（Rawson 7）

实际上，这也是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两个具有危险倾向的现状：一是用理论来的场外征用对文本做出强制阐释，另一个则是用理论取代文本。罗森教授的这一立场也是近年来学者们面临西方文论之于文本阐释时所发现的批评局限与缺憾。张江指出，当代西方文论有四个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的特征：“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

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张江 5）。张江所指出的西方文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罗森教授对于目前批评家忽略文本、故弄玄乎，在理论推演中得出看似方法正确但是偏离文本的偏颇结论这种荒唐现象的隐忧与不满。

聂珍钊教授创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初衷，也是希望可以在面对大量引入的西方文论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坚守文本阅读，不要背离文本，在文本中发现可供文类文明进步提供参照价值的道德范例，同时也需立足中国视角，有自己的学术创新和价值判断。他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它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聂珍钊 5-6）。罗森教授认为，聂珍钊教授所开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对文本阅读的重视和强调，正是当下学界所缺少和急需的，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也更令人钦佩。在罗森教授看来，文学作品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而批评行为只是批评家基于文学作品的次要活动。罗森教授说：

在伦理批评这一严格框架下，尽可能广泛地研究，这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是一项令人钦佩的挑战性事业，它承担着对我们研究的文学文本的责任。这些文本是，也应该是我们职业的真正伦理焦点。我最近惊讶地收到一份来自一家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手稿，该手稿提议文学批评作品应与我们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文学作品放在同等地位上研究。在我看来，这在心智上是不受尊敬的，实际上也是不道德的。它赋予职业实践者一种中心地位，这对他或她的学科内容是一种冒犯。它给一个本应指向理解研究对象而非批评者次要活动的实践，引入了一种有害的自我关注和自我重要感。正如我在过去常常指出的，我们作为文学教授的职业是认识、理解和分析文学创作以及关于我们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文学。（Rawson 8）

罗森教授一方面鼓励和倡导文学批评的学科拓展，进而发现文学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高度融合。他甚至以人工智能为例，认为过去这只是在科幻小说里才出现的事物，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学术研究的精神就是在于对经典文本和批评方法的扩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脱离和舍弃文学研究的最核心对象文学文本。罗森教授认为这不仅是一种不成熟、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是对批评家职业的冒犯。文学教授的任务是关注文学创作，是

去“认识、理解和分析文学创作以及关于我们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文学”（Rawson 8）。

在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时，聂珍钊教授重点强调了如下五个方面：1. 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研究；2. 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研究；3. 文学文本的艺术表达研究；4. 作家与创作研究；5. 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研究。¹ 在深入研究文学作品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力图把虚构的艺术世界同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及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以及作者与创作、文学与社会等诸方面的道德关系问题”（聂珍钊 99）。文学伦理学批评试图把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现实世界的价值观进行结合，并且从虚构艺术中发现道德范例供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参考，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学作品的价值观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价值观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分歧。罗森教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在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开幕式致辞中强调说：

文学作品的价值观与我们道德思考中所遵循的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这一问题都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所有伟大作家，他们崇敬荷马，但却谴责军事荣耀的概念，并发现宏大的演讲异常诱人。像伊拉斯谟或布莱克这样的一些人，实际上认为史诗诗人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诗人在表达这些担忧的同时，也尝试通过自己的英雄口吻或史诗作品而直面这些担忧，其中包括朱文纳尔、伊拉斯谟、莎士比亚、弥尔顿、蒲柏（他翻译了荷马）、伏尔泰、费尔丁、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布莱希特，以及在现代主义极大改造下的 T.S. 艾略特的《荒原》和庞德的《诗章》。（Rawson 3）

在罗森教授的理解中，文学作品的价值观与我们道德思考中所遵循的价值观之间的分歧问题困扰着所有历史时期的伟大作家。譬如，史诗是最为不朽的文学样式之一，荷马也是最伟大的史诗诗人，不过后世作家们对荷马笔下的战争以及“军事荣耀”（military glory）却难以苟同，甚至布莱克都认为史诗是引发战争的原因之一。因此，围绕史诗这一文学样式，很多作家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对之改造。在这种意义上，作家及其创作研究构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聂珍钊教授看来，围绕作家及其创作，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研究“作家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立场以及其观念和立场的特点、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形成的过程；探讨作家的伦理观念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的关系；探讨作家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对后来作家及文学的影响；探讨作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如作家在作品中关于伦理道德现象的描述，作家对其描写的各种社会事件及其塑造的人物的道德评价

1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100页。

等”（聂珍钊 100）。

尽管罗森教授目前已经卸任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会长，但他作为荣誉会长依然关心和支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并以荣誉会长的身份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第十一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再次发表书面致辞。所有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会员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实践者所要铭记的是罗森教授和聂珍钊教授给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使命定位，即重构文学批评本来应该具有的柔韧性和微妙性，尊重历史、忠实文献。罗森教授说“就如聂珍钊所说的那样，IAELC 最高贵的使命是恢复批评学科本应具有柔韧性和微妙性，其与核心人文目的的结合，不拘泥于教条，忠实于其文献，尊重历史知识，简而言之，以最佳且最具感知力的阅读方式展开实证研究”（Rawson 6）。我想，罗森教授的上述话语不仅是对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使命担当的恰当概括，同时也是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特征与魅力的准确表述。

罗森与我

2014年，我负责在上海交通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多达300余人，其中国际学者将近40人，包括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查尔斯·伯恩斯坦，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吉辛大学安斯加尔·纽宁，德国海德堡大学副校长维拉·纽宁，《语言与文学》杂志主编、英国诺丁汉大学杰夫·霍尔等。那一年，我只有35岁，刚刚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办会经验，都颇为不足。坦率地说，尽管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们的大力支持、指导和关心，但实际上自己对于能否办好这次国际会议还是信心不足。

会议拟定在2014年12月19日-22日召开，而我专门提前8个月，在2014年4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给罗森教授发去了参会邀请，希望他可以再次回到他的第一故乡上海，莅临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实际上，罗森教授也是我发出邀请的第一个海外学者。罗森教授当即给我发来了回信，表示如果身体允许，一定会来参加会议，而且他还在信中给了我很多鼓励，认为会议一定可以圆满成功。鉴于罗森教授行动不便的身体状况，我在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多次联系了学校的国际交流处，为他申请了商务舱来华的费用，并及时将这一信息告知了他。让我深受触动的是，罗森教授在回信中给我发了很长的文字，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心，同时表示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暂时不要预定机票，万一临时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可能会给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一细节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充分反映了他在日常生活中在细

节之处为他人考虑的处事品格。随后，我一直与罗森教授保持邮件联系，希望他的身体状况能够改善，可以成行上海。

2014年，10月1日，当我再次和他确认上海行程以及预定机票的时候，罗森教授明确告诉我因为身体不便，上海之行不得不取消了，在邮件中表达了莫大的遗憾，不过同时表示自己可以为大会写一份简短的书面致辞，而这也是罗森教授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4年12月13日，在会议召开前夕，罗森教授给我发来了他写好的开幕词，虽然简短，但高屋建瓴。全文翻译如下：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
上海，2014年12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被任命为这个受人尊敬的学会的副会长，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学会的目标。非常遗憾我不能参加今年在我出生地上海举行的会议。但我希望将来能够回去，我对去年在宁波举行的会议的演讲有着最温暖的回忆。

在我缺席的时候，我想退一步考虑一下我们标题中“道德”一词的含义。《牛津英语词典》中最适用的定义是：“符合道德原则或伦理；道德正确的；光荣的；有道德的；尤指符合职业伦理”。这些是我们所有人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但我特别想强调牛津英语词典强调的那一点，“尤指符合职业伦理”。文学教授的事业是书籍和有关书籍的知识。我相信我们必须回归的第一个道德原则就是支持这个具体原则：教授我们主要文学作品的书籍，并提供帮助我们理解它们的信息。很遗憾的是，我们行业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西方，在这方面犯了很大的错误，更喜欢理论而不是阅读，更喜欢抽象概念而不是知识。然而，当理论应用于文学时，只有在实际阅读书籍的基础上才能有意义，而这恰恰被我们的从业者给忘记了。我们迫切需要回归最初的原则。我们是，或者应该是，文学的教师。这是我重申的，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问题。我建议放弃理论课程二十年，并回归阅读书籍。如果我们对此仍然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二十年的阅读之后回到理论。

我希望你们会享受这次会议，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像去年在宁波举行的那次会议一样热烈。

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

2013年开始，我开始担任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因为学会工作的缘故，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罗森教授，切实体会到他对学术的执着认真，对朋友的友善真诚，对后学的提携帮助。2021年9月25日，在聂

珍钊教授的组织下，浙江大学召开了庆祝玛乔瑞·帕洛夫教授 90 岁生日的国际诗学会议。罗森教授和帕洛夫教授从 1973 年开始相识，成为一生的挚友。在这次会议上，尽管罗森教授行动和说话已经十分不便，但还是撰写了书面文稿，交由自己的妻子琳达女士代为朗读。文稿中，罗森教授高度评价了帕洛夫教授的学术成就，并追忆了自己与帕洛夫教授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往。琳达女士以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Queen's English）款款朗读罗森教授写下的文字，而罗森教授则端坐一旁，深情望着琳达，满眼皆是爱意。哪怕是在云端，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罗森教授与帕洛夫教授之间无坚不摧的友谊，他与爱妻琳达心灵相通、携手白头的爱情。时隔 4 年，罗森教授也即将迎来自己的 90 岁生日。作为后学和来自他第一故乡上海的青年学者，笔者不揣浅陋，口占小诗一首：

九旬春秋谱华章，
 岁月悠悠敬天长。
 白发智慧如星汉，
 金心温暖似日光。

谨此，祝罗森教授生日快乐！

Works Cited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Rawson, Claude. ““Good Criticism Is Ethical”: Claude Rawson’s IAELC Presidential Addresses.”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3): 1-8.
- Rawson, Claude and Marjorie Perloff. “Claude Rawson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jorie Perloff.” *Textual Practice* 4 (2017): 603-629.
- 王松林：“比较文学的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兼论克劳德·罗森的学术创新”，《外国文学研究》2（2013）：126-132。
 [Wang Songlin. “Towards Close Reading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Review of Claude Rawson’s Academic Innov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3): 126-132.]
- 徐燕、溪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局面和生命力——‘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研究》6（2013）：171-176。
 [Xu Yan and Yi Yu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Vitalit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171-176.]
-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6（2014）：5-18。
 [Zhang Jiang. “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Literature Review* 6 (2014): 5-18.]